

军事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成长^{*}

● 孙 力

摘 要:掌握军事活动的规律,提高军事斗争的水平,是创建现代国家的关键性要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军事历程既书写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篇章,也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军事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军事转型相对走在前列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建构为前者所引导。特别是国家的治理模式受到军事的深刻影响,同时,国家治理的精英队伍大大依赖于军事领域的人才供给。军事与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关联重要而又复杂,要做到两者的和谐发展不仅需要正确地把握两者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关联,还应该有更宏观的战略思维和对人类现代化的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探索形成全新的模式。

关键词:军事;现代国家;内在关联

中图分类号:E4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9)03-0181-06

作 者:孙 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国家诞生起,军事就是国家发展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之一,必然地,军队发展和军事活动一方面反映国家成长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它又深刻地影响国家历史变迁的轨迹。探索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具体说,应该是政治哲学、军事政治学承担的使命。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是枪杆子产生的政权,这样一种新的国家构建其历史意义和深刻影响在哪里?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军事活动在国家现代化的推进中举足重轻,尽管早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各自作用的模式不同,但现代国家都深深地打上了军事活动留下的烙印。事实证明,探索现代国家成长的规律不能离开军事活动的作用,聚焦于这个方面,恐怕能够使我们现代国家的成长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

掌握军事活动的规律,提高军事斗争的水平,是创建现代国家的关键性要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军事历程既书写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篇章,也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人类迈入近代史的过程,也是创建现代国家的过程,现代国家所体现的现代政治结

^{*} 本文为军队 2110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立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构,是人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撑。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现代国家创立,就没有离开军事斗争的要素。英国号称“光荣革命”,实现阶级的妥协,但如果没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奠定的历史前提,就很难设想詹姆斯二世会落荒而走。法国的现代政治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两次革命时说:“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1]321} 更需要注意的是,拿破仑所展开的军事行动,震撼欧洲,震动世界。成功的军事行动成为传播法国革命思想,摧毁旧制度的首要工具。法律是制度的载体,《拿破仑法典》广泛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得不首先归功于拿破仑辉煌的军事胜利。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谈到:“这一革命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和专制的警察专横以后,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2] 523-524} 很显然,新兴阶级军事上的胜利,促进了更多的民族更快地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

美国代表着另外一种现代国家的诞生模式,即不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而是同外部殖民主义的民族斗争模式。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华盛顿领导的对英军作战的胜利,美国不可能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美国现代国家诞生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以武装斗争反抗民族压迫而创建现代国家的道路,对其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无启迪。遗憾的是,美国后来又往往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绊脚石,成为许多封建落后政权的帮凶。

社会主义开创了现代国家成长的全新模式——这还不是以马恩所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为基础作出的判断——恰恰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判断。可以分析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是在缺乏近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造现代国家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创立都面对非常浓厚的封建主义政治传统,而不是接受过文艺复兴等先进政治思潮和运动洗礼的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其二,社会主义经历的现代国家成长和现代军队的成长密切交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与现代军事历史的伟大篇章和军事奇迹交相辉映。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作略微多一点的阐释,他们对暴力革命讲得比较多,但他们讲的暴力革命同后来社会主义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是不一样的。马恩在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暴力革命,主要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其形式是城市战,即在城市内部展开的筑垒巷战。从1848年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都是如此。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机器的完善,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作了新的思考。一方面,他坦率地承认“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另一方面又补充:“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它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3]520} 针对新的形势,恩格斯指出,要建立一支“决定性的‘突击队’”,为“决定性的博战”做好准备,“要把他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609}

俄国十月革命就革命的爆发来说,基本上遵循了马恩的设想,但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来说,又大大丰富了马恩的思想。十月革命是城市暴动的成功,但社会主义的国家要生存下去,又不得不依赖于军事斗争,依赖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建设,这是全新的课题。红军是革命成功后的产物,但又是新政权存活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国内的武装叛乱和国



际的军事干涉把新生的红色政权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之所以没有像巴黎公社那样短暂胜利后悲壮地失败,军事上的成功和红军的建设是关键因素。实际上这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不仅仅是工人武装起义的问题,应该做好长期的军事斗争的准备,应该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这一新的实践是同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俄国革命已经开始显现军事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的重要联系,那么,中国革命则是军事斗争锻造社会主义国家全面、生动的演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已经过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和打垮了反动政权的军事力量后所取得的。正如毛泽东总结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4]54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军事思想是其中极为出色的内容。中国是第一个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展开了如此惊天动地、波澜壮阔军事斗争的国家。28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枪一弹,到打败用先进装备和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侵略军,以及消灭 800 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创造了人类军事历史上的奇迹,也书写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篇章。就毛泽东思想体系来看,军事思想占有很重的分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在军事领域的贡献突显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也不可能对军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有如此丰富和深刻的阐述。这是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对现代国家建设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二

军事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军事转型相对走在前列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建构为前者所引导。特别是国家的治理模式受到军事的深刻影响,同时,国家治理的精英队伍大大依赖于军事领域的人才供给。

现代国家的政治成长道路与军事问题水乳交融,宏观地说,军事本身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脱离军事来探讨政治的沿革就不可能避免谬误和偏见。即使是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表面上看,军事似乎已经摆脱了政治本身,但透过表象仍然不难揭示两者结合的内在逻辑。

军事与现代国家政治成长的关联从历史进程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类是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走在军事转型的前面;另外一类则是军事转型走在政治转型的前面。英、美、法等先行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属于第一种类型。前一类国家较早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较早开始形成,军事的现代转型则是现代政治框架形成后的产物。英国从 1215 年颁布《大宪章》开始了宪政建设,14 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形成两院制的议会结构,到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已大体形成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而这时,军事的现代转型可以说还未开始或刚刚开始。直到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军队还是传统的组织形式。此后,议会开始通过法律切断国王同军队的联系,对军队实行一系列的改造,使之与其现代政治体制相适应。法国的状况也大体如此。美国在殖民地时期议会制度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独力革命后不久,即基本完成了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构建。这样一种政治进



程,使得军事的现代转型完全处于已经确立的现代政治的引导之下。

后一类的国家则展现出另外一种景象。这类国家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摧毁传统封建专制构建现代政治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事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很容易受到外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清政府开始建立新军,中国就开始了军事的现代转型,并且一直受到持续的推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都重视推动军事的现代化。相比较而言,政治的现代化,如民主和法治建设则步履维艰,远远落在后面,不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事领域现代化的先行就对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治理模式受到军事的深刻影响。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危机的进程。亨廷顿将之概括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5]38}。政治现代化为社会现代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保障,但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远远不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来就不稳定的社会就更容易陷入动乱之中,而动乱则严重地阻碍现代化的进程。所以亨廷顿很现实地归结为“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5]7}在封建专制受到唾弃,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又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军事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就成为别无选择的替代了。我们由此而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景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军事转型的功能发挥,最突出的不是体现在战场上,而是体现在国家的治理上。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把中国的政治发展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认为军政是走向宪政的首要基础。

治理模式的军事化色彩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十分鲜明,当然表现的形式又多种多样。最直接的就是实行军事管制,用军队来接管国家政权。许多国家在特定时期都采用过这一手段。这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场景,或者说一个阶梯。另外一种形式是组成军人政权。军人政权不仅是以军队来维持社会秩序,实行一种过渡,而是武装力量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以军队的统帅模式来统帅国家,并力图长期执政。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经历过这一模式。拉丁美洲就以建立军人政权而著名。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拉美纷纷建立军人政权,到70年代初,除极少数国家外,拉美国家均由军人控制政权。除此以外,发展中国家军事化的治理还广泛体现在权力集中的模式上,基本排斥了分权、多元、自治等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取向。

对军事化治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响民主政治的推进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专制主义、权威主义乃至(集权比较轻的)威权主义,都是与民主政治相冲突的。但它们两者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进程上作一个时序的考察,即:究竟是军事化治理阻碍了民主进程呢,还是民主发育不良而导致了军事化治理?军事化治理是应对社会动乱的猛药,这一方子在动乱频仍的现代化进程中被累累祭起,应该有它的内在根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发展中国家治理的精英队伍大大依赖于军事领域的人才供给。可以普遍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人物往往都具有丰富的军事经历的现象。治国的人才如何培养,这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建设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然而,由于军事转型走在前列,军队成为社会现代化的标杆,军官及军队的统领人物脱颖而出并不是奇怪的事情。转型社会的军事斗争,是政治的聚焦,政治家如果不关心军事,不懂得战争,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崭露头角。这就像早期现代化国家,议会政治斗争的

主要舞台,不懂得议会、立法、选举,就不可能成为当时的领袖人物一样。从社会管理的层面看,军队首先构建了系统的科层体系,设置了严格的法纪规范,形成了令行禁止的运作作风,有完善的决策—参谋系统等等,这在特定时期为打造治国的精英队伍提供了其它领域难以比拟的环境。

三

军事与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关联重要而又复杂,要做到两者的和谐发展不仅需要正确地把握两者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关联,还应该有更宏观的战略思维和对人类现代化的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探索形成全新的模式。

现代国家的经济成长越来越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军事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方面。从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来说,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需要把军队和国防建设置于重要的地位。但现实的悖论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安全资源与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构成难以协调的冲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财政支持是不言而喻的,而经济建设也几乎都面临资本稀缺的困境,协调这对矛盾,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考验。有的国家在这一进程中采取依赖超级大国提供军事保护的策略来渡过这一难关,绕过这一矛盾,但这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另外的负面效应以及严重的后果。

不仅在资源的配置上,军事对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而且深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些内在需求上,如果错置了军事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其产生的危害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弥补的。前苏联的发展就是深刻的教训。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国防建设开足了马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苏联全国的经济实力不到美国的一半,但其国防开支与美国相差无几,建成了一支对美国产生强大威慑力的军队和强大的国防。然而,军队和国防的发展不仅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而且更深层次地影响到苏联整个的经济结构。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求,大大刺激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结构出现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带来的危害是逐步显现的,等到其较清楚暴露时为时已晚。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农轻重的比重达到2:2:6,消费品严重短缺,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失调的结构使增长速度连续下滑,1990年竟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卢布,8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最后是政权的崩溃。这样的发展战略表面上建设了强大的军队和国防,但却并没有实现它的社会发展目标,强大的军队和国防没有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样的军队和国防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全新的模式。

首先,在资源配置上,不仅注重妥善配置军事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比例,更重要的是,特别强调对政治资源的继承、创造和运用。中国当然迫切希望加快军队和国防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底子还很薄,经济建设的任务很重,经济建设的基本地位不能动摇。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妥当的军事与经济发展资源分配的比例关系。直到2006年度,中国军费也才达到2838.

29 亿元,其人均军费仅为美国的 1/77。与物质资源的有限相映衬的是政治资源的充分运用。新中国的国防,从来不缺少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文化底蕴的支撑,这样一种精神文明把中华民族塑造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惧强权、誓死捍卫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也就把战争的伟力蕴藏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让任何侵略者为之胆寒。中国的军队,不断发扬光大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革命英雄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锤炼了官兵刻苦训练,敢打必胜的坚强信念。有限的资源和技术装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中,其功能往往被发挥到极致。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再一次证明军队和国防的强大,不仅仅在于物质的基础。革命化置于我军“三化”建设之首,深入理解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可以认识到其中内涵着深刻的、辩证的军队和社会发展逻辑。

其次,在发展的步骤上,不仅重视军事与经济协同推进战略,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实施有重点的梯度推进战略。从总体上讲,中国的军事与经济是协同推进的,发展的进程是相互适应的。然而,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而又资源有限,只强调均衡发展,未必是最佳战略。但正确地实施有重点的发展战略又是极为困难的选择,一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恰恰在这里。实践证明,中国在特定时期实施的有重点的梯度推进战略是成功的。最典型的就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暂时忍耐的战略。这一战略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对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后的决策。如果我们依然囿于战争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还要立足于打核战争等判断,就无法对军事和经济建设作如此的安排,也就不可能迅速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结束忍耐的阶段后,像今天这样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空前强大的物质基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军事与经济越来越被置于了整个社会追求科学、和谐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它力图超越传统的局部与全局的发展之争,扭转以现实发展遮蔽和危及长期发展的趋势,制止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倾向。科学发展观的最新概括“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论断,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统领,也为处理好军事与经济及其它方面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的学说,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对人解放以时代的提升,军队和国防的强大,人是起主体性作用的,这是永远不能丢弃的我们的优势所在。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统筹兼顾,将保证军队和国防建设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与现代国家成长的辉煌篇章。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美)S·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 张云)